

# 试论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 美国外层空间政策

张 杨

**内容提要** 本文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在冷战背景下,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带来的冲击和人类对一个全新领域的初次涉入使艾政府的外空政策经历了几次反复,最终确立了具备一定指导意义、较为普遍适用的美国国家外层空间政策。

**关键词** 艾森豪威尔政府 苏联人造卫星 NSC5520 NSC5814/1 NSC5918

20世纪初期,人类对外层空间的研究与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外层空间研究和技术发展真正成为—种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安全政策和国家科技政策的一部分,则始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艾森豪威尔任内,苏联卫星的成功发射是人类历史上、也是冷战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人类从此进入了“太空时代”,也进入美苏在外层空间激烈竞赛的时代。相应地以此为标志,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分为三个时期: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前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后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经历的“震荡期”;以及“尘埃落定”后对外层空间政策进行反思的“平复期”,最终确立了既带有冷战特征又符合艾政府决策层思路的美国国家外层空间政策。

## 一、苏联人造卫星发射之前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

艾森豪威尔就职以来,美苏冷战持续深化。由于缺少可靠的侦察手段,美国对苏联的疑惧加深,1954年3月27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白宫会议上要求防御动员办公室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就可能的苏联突袭和减少这种突袭威胁的技术能力进行评估。应总统要求,该顾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42人组成的技术能力小组(TCP),小组负责人就是后来成为总统科技特别助理的詹姆斯·基利安。该小组于1955年2月14日完成了题为《应付突袭威胁》的报告,简称基利安报告。基利安报告是战后美国智囊机构为数众多的评估报告中最为重要的报告之一,它直接导致后来的U-2飞机计划、空军侦察气球计划的产生以及美国制导导弹政策等的重大转变。

---

根据 NSC5918 号文件,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是有关美国在与外层空间相关的科学、民用、军事和政治活动有利益关系的政策。它包括探空火箭、地球卫星和其他空间运载工具,它们与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政治和精神意义。《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技术能力小组报告》(“Report by the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Panel of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美国外交文件 1955—1957》(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 - 1957*) 第 19 卷,华盛顿 1990 年版,第 41 页。

然而,对于美国的外层空间政策来说,基利安报告更重大的意义在于它第一次将制造一颗人造卫星的问题提到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的议事日程上来。基利安报告中有关外层空间的建议有两处:在总体建议的第9-b项,报告建议对空间自由的国际法定义做一重新审视;在特殊建议的第D-14项,报告建议通过更好更安全的通讯手段来加强美国军力,为此,要“对一个人造卫星传输系统进行研究和评估”。

得益于两个重要因素,国防部迅速确定了一个发展科学卫星的计划。其一,战后美国宇航学的发展和战败国德国火箭、导弹技术资料的传入为制造一颗卫星提供了理论可能性;其二,当时国际科学界筹备的国际地球物理年(IGY)活动也推动了卫星政策的出台。基利安报告提交当日,美国国家科学院将一个科学卫星倡议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负责人艾伦·沃特曼转呈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取得国防部和国务院官员对卫星计划的支持。正如副国务卿代办墨菲所说,“毫无疑问,[这样一颗卫星]会增加美国的科学声誉,并在冷战中有相当大的宣传价值”。但真正使艾森豪威尔同意这个科学卫星计划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艾森豪威尔认为一颗为国际科学活动而放入天空的卫星将有助于确立“空间自由”原则,这样“开放天空”立场将自然延伸到外层空间;另一方面,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而非国防部资助一颗科学卫星,也免于触动苏联对于“飞越领空”的敏感神经。

1955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国防部提交的题为“美国科学卫星计划”的高级政策文件,即NSC5520号文件。文件是美国对于开发外层空间的态度和指导原则的最早政策文件。它首先肯定美国已有技术能力制造一颗科学地球卫星;接着指出这样一颗卫星除具有科学价值外,还具有军事价值,即“在防御通讯和导弹研究方面有适当的应用”;最为关键的是,文件表明这样一颗卫星的目的是“为‘空间自由’原则提供一次试验”。

从1955年6月起,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实施协作委员会陆续把政府各部门对基利安报告的观点汇总在一起,经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形成NSC5522号文件。关于是否要对“空间自由”有一个事先声明,“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和司法部一致认为:美国的任何关于空间自由的声明都是不必要的”,美国需要的是用一颗人造卫星来确立这一原则。

由于NSC5520号文件特别指示科学卫星计划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相连,因此计划很快转入程序性的实施阶段。虽然人造卫星本身要由科学基金会资助科学机构完成,它的发射运载工具仍要由三个军种通过“竞标”来实现。当时陆军在弹道导弹局的冯·布劳恩领导下已有了较

《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第19卷,第46,55页。

1950年春,美、欧科学家集会,决定通过一些国际项目来研究上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的性质,该活动在时间上与太阳活动的剧烈期相同,即1957年7月1日到1958年12月31日,科学家们将这一时段命名为国际地球物理年。

德韦恩·戴:《公开的故事和隐藏的项目:美国早期空间和国家安全政策》(Dwayne A. Day, “Cover Stories and Hidden Agendas: Early American Spa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罗杰·劳尼斯、约翰·洛格斯登主编:《重新思索苏联人造卫星:第一颗苏联卫星发射以来的四十年》(Roger D. Launius, John M. Logsdon, eds., *Reconsidering Sputnik: Forty Years since the Soviet Satellite*),纽约2000年版,第166页。

詹姆斯·哈福德:《科洛夫:通往月球之路上击败美国的苏联策划者》(James J. Harford, *Korolev: How One Man Masterminded the Soviet Drive to Beat America to the Moon*),纽约1997年版,第121—137页。

《美国科学卫星计划》(“U. S. Scientific Satellite Program”),《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第11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723—726页。

《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第11卷,第723—726页。

德韦恩·戴:《公开的故事和隐藏的项目:美国早期空间和国家安全政策》,第169页。

德韦恩·戴:《公开的故事和隐藏的项目:美国早期空间和国家安全政策》,第169页。

成熟的基于“红石”导弹的“轨道”卫星计划；空军由其下的西部发展委员会提交了一个草案；海军则提交了用“海盗”探空火箭发射卫星的计划，即后来的“先锋”(Vanguard)计划。由国防部组织的听证会最终选择了“先锋”计划，并得到艾森豪威尔的批准。

为什么选择了技术难度比“轨道”计划大得多的“先锋”计划？当时有一种说法是，听证会的许多顾问成员对冯·布劳恩及其主要由德国科学家组成的同事心存偏见，但艾森豪威尔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解释：“虽然海军将为人造卫星提供发射设备……不能让它妨碍我们最优先的导弹工作。人造卫星的计划绝不与闻任何秘密的导弹情报。”也就是说，选择“先锋”计划是为了不干扰冯·布劳恩正领导的弹道导弹工作，也不泄露美国弹道导弹发展的信息。

1955年7月29日，总统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代表艾森豪威尔宣布美国将为国际地球物理年发射一颗科学卫星。

## 二、“震荡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

正当美国的“科学卫星”计划踱步前行时，1957年10月4日，苏联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5日，苏联官方报纸《真理报》宣布了这颗卫星的成功，并自豪地宣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为世界科学与文化宝库做出了最为重要的贡献”；“我们的时代将见证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们做出了怎样自由而尽责的努力去实现人类大胆的梦想。”

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给美国和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纽约时报》当日就用极为罕见的0.5英寸大写字母横贯首页报道了这一消息；英国的《曼彻斯特卫报》则肯定地说，“俄国人现在可以制造能够打到世界任何既定目标的弹道导弹了。”苏联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使艾森豪威尔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困境。

在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巨大压力下，艾政府早期的空间政策几乎全被推翻。卫星计划与导弹计划相分离的原则不得不放弃，在10月8日的白宫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指示把从前否决的陆军“红石”计划作为“先锋”计划的一个后备；与此同时，卫星项目也终于获得同弹道导弹平起平坐的地位，1958年1月2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352次会议对“弹道导弹和卫星项目的优先性”进行讨论，两天后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行动指令1846，将“国防部认为有重要的政治、科学、精神或军事重要性的”卫星项目列为重点优先项目。

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的又一后果是政府机构意义深远的组织调整与新建。1957年底，应一些科学家建议，艾森豪威尔宣布了几项组织变更。首先，建立总统科技助理办公室，由基利安出任第一任总统科技特别助理；其次，原属防御动员办公室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移交给白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下），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234页。

《关于第一颗卫星的宣告》（“Announcement of the First Satellite”），苏联《真理报》（Pravda）1957年10月5日，转引自 <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14.html>。

《下一站是火星吗？》（“Next Stop Mars？”），英国《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957年10月7日。

《与总统会议备忘录，1957年10月8日》（“Memorandum of a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第19卷，第598页。

《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3卷，华盛顿1996年版，第30页，脚注2。

宫,重组并扩大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最后,建立高级研究计划局,三军的空间项目在名义上都转入它的名下。

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后,美国公众和国会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独立的民间机构来负责美国的科学卫星计划,艾森豪威尔却认为这会造成更大的重复。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使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向国会低头。1957年11月3日,苏联第1颗人造卫星发射后仅一个月,苏联又成功发射一颗卫星,其上还载有一只叫“莱卡”的小狗。赫鲁晓夫不失时机地嘲弄说,“看起来‘先锋’这一名字反映了美国人的自信,即他们的卫星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但……是苏联卫星证明了领先,证明了‘先锋’。”更令艾政府狼狈不堪地是,美国政府寄予重望的“先锋”计划,在12月6日第一次试验发射时就在发射台上爆炸了,而此前消息已经公布出去,全世界科学家都在静候接收卫星传输的数据。国务卿杜勒斯在次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上几次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连连说“昨天发生的事对美国的外交关系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对美国来说是一场悲剧”。

在此背景下,1958年4月2日,艾森豪威尔把一个授权成立民间宇航机构的宇航法案送交国会。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国会辩论,法案终于经参、众两院审批通过,7月29日由艾森豪威尔签署生效。《1958年国家宇航法》(公共法#85-568)授权成立了指导外层空间活动的国家宇航局(NASA)。法案在明确国家宇航局的职权范围是“非军事”性质的同时,也规定其要在有关的空间活动中与国防部配合。法案的目的部分强调美国要在大气层内外航空和空间科技及其和平应用领域扮演领导角色。宇航局成立后,艾森豪威尔曾几次说过,“它的全部项目都是基于精神价值……人造卫星造成的群情激愤是宇航局创建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见,成立宇航局并不符合艾森豪威尔本意。

1958年5月15日苏联又把重达1327公斤的第三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苏联卫星接连升空使美国政府感到制定专门外层空间政策的迫切需要。

1958年6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名为《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政策》的草案,被编为NSC5814号文件。经国家安全委员会几次讨论后,艾森豪威尔于1958年8月18日批准该文件,更名为《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初步政策》,并重新编号为NSC5814/1号文件。这是艾政府关于外层空间的第一份详细的政策文件。文件表明美国在外层空间活动中的目的是“发展和开发美国的外层空间能力以获得美国的科学、军事和政治目的,并建立美国在这一领域公认的领导地位”,以及“利用外层空间潜力增强针对苏联集团的‘开放天空’的努

---

“编者按”(Editorial Note),《美国外交文件1955—1957》第19卷,第661页。

保罗·斯塔尔斯:《太空军事化:美国的政策1945—1984》(Paul B. Stares, *The Militarization of Space: U. S. Policy, 1945 - 1984*),纽约1985年版,第41页。

詹姆斯·哈福德:《科洛夫:通往月球之路上击败美国的苏联策划者》,第121—137页。

《在NSC第347次会议上的讨论,1957年12月5日》(“Discussion at the 347<sup>th</sup> Meeting of the NSC”),堪萨斯阿比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艾森豪威尔文件1953—1961,NSC系列,第9箱,安·怀特曼档案,1957年12月6日。

《1958年国家宇航法案》(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ct),Pub. L. No. 85 - 568。

《在NSC第415次会议上的讨论备忘录,1959年7月30日》(“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415<sup>th</sup> Meeting of the NSC”),《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3卷,第277—284页。

《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初步政策》(“Statement of Preliminary U. S. Policy on Outer Space”),《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2卷,第845—863页。

力”。总体来看,NSC5814/1号文件留下了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后震荡期的明显痕迹,它明确表示苏联在外层空间领域的优势破坏了美国的威信和领导地位,并威胁着美国的安全,因此美苏必然要在外层空间领域进行技术竞争和战略对抗。

### 三、“平复期”的美国外层空间政策

从1958年开始,美苏在卫星试验方面都经历了一些失败,也各自取得了一些成绩。1959年7月,美国情报署就《美苏空间活动对世界舆论的冲击》这一主题做出一份评估报告,得出的结论为,尽管“没有在总体意义上恢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前美苏能力的差距,或消除对于苏联和苏联社会的新的印象”,美苏的空间活动基本上“恢复了一种平衡”。然而,苏联人造卫星发射带来的紧张心情刚刚平复,“震荡”期空间政策的种种弊端就凸显出来。

苏联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之初,为了消除国内民众“那一阵半歇斯底里的浪潮”,艾政府不得不“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加速导弹和人造卫星计划”。这使得许多外层空间项目无计划性的匆忙上马,重复混乱且没有长期发展规划。早在1959年初,国家宇航局已经发现“目前的一组推进器运载工具……都是匆忙组装成的,在迎接苏联卫星威胁的压力下,没有一个具有国家空间项目未来所需的设计特征”。

基于上述认识,艾政府先前的外空政策文件NSC5814/1被置于国家宇航委员会的重新考察之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把外层空间政策正式写入美国《基本国家安全政策》(NSC5906)中,外层空间政策正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在讨论“外层空间政策之基本目的”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分成阵线分明的两派,一派认为美国只要领先就可以了,不必问第一或第二;另一派则认为美国应当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取得“优势”。艾森豪威尔的立场不稳加剧了问题的分歧:7月23日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还支持从精神考虑出发,美国必须取得“优势”地位,7月30日他又转而反对“优势”这一提法,认为这完全是跟着苏联走,而“我们并不清楚苏联在外层空间领域正在做什么”。争论不决,结果只得同意在NSC5814/1号文件考察完毕前,暂时采用原来的说法。

1959年12月17日,宇航委员会将《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政策》的草案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编号为NSC5918号文件。文件经1960年1月12日会议讨论,略作修改后通过,取代NSC5814/1号文件成为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指导文件。关于美国实施外层空间活动的目的,文件这样表述,(a)通过空间技术的有益应用和通过相关事项上的适当国际合作去获得科学知

《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初步政策》,《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2卷,第845—863页。

美国情报署研究与分析办公室:《美苏空间项目对世界舆论的冲击》(U. S. Information Agency, Office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Impact of U. S. and Soviet Space Programs on World Opinion”),堪萨斯阿比林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美国总统的海外信息活动委员会(斯普拉格委员会)记录,1959—1961,第6箱,A83-10,1959年7月7日。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第237页。

《国家宇航局提交给总统的报告》(“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resented by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国图缩微胶片3289:《NSC会议记录附专门咨询报告1947—1960》(“NSC Meeting Records 1947-1960”)第3卷。

《基本国家安全政策》(“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3卷,第314页。

《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3卷,第277—284页。

内容详见《美国外交文件1958—1960》第3卷,第314页。

识、军事力量、经济能力和政治地位的提高；(b) 获得来自空间成就的好处。与 NSC5814/1 号文件相比，NSC5918 号文件在评述苏联空间优势和美苏空间竞赛问题上平和了许多。它比较客观地论述了开发外层空间对于人类的普遍利益，并强调外层空间在科学和民事方面的应用价值。NSC5918 号文件指明了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总体方向，因而成为美国外层空间政策史上的一份基本指导文件。

#### 四、对艾政府外层空间政策的一点思考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层空间政策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冷战特征，这种国家政策制定中的冷战因素又渗入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决策风格，最后凝定成型为美国初期的外层空间政策。

冷战特征之一是对立双方互不信任，特别是在苏联掌握了核技术的条件下，美国为了保证自身“绝对安全”，竭尽全力想获取一切关于苏联军事的情报。艾森豪威尔一向重视“知己知彼”，终其二任，对苏联战略核武器进行有效核查一直是他的既定政策。因此，艾森豪威尔对“空间自由”（开放天空）合法化的追求超过了对“空间第一”的追求。苏联人造卫星计划起步不比美国早，在某些重要环节上甚至晚于美国。根据已解密的前苏联文件，1954 年早期苏联科学家齐赫拉沃夫（Tikhonravov）提出关于卫星可行性发展的第一个详细报告，并交给苏联第 88 科学研究所（НИИ - 88）第一特别设计局（ОКБ - 1）的负责人科洛夫（Korolev）。科洛夫在 1954 年 5 月 26 日第一次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用 R - 7 洲际弹道导弹发展一颗人造卫星的请求。然而，直到得知美国要为国际地球物理年发射一颗卫星后，苏联部长会议才在 1956 年 1 月 30 日颁布了一个法令（序号为 149 - 88ss），要求苏联也为国际地球物理年制造一颗人造卫星。然而，苏联的政策目标是既定的，就是要获得“空间第一”，要在外层空间领域领先于美国。科洛夫等人最初设想的卫星重约 1000—1400 公斤，但到 1957 年初，卫星计划的进度远远落后于时间表，而据媒体报道“美国已在精心准备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此，苏联改变初衷，决定要尽早发射两颗小型“简单卫星”。

美苏之空间政策目标不同，使得苏联人造卫星的升天既直接实现了苏联的政策目标，也间接实现了美国的政策目标。对苏联来说，第一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使苏联取得“空间第一”的地位，也使苏联关于本国导弹能力的说法增加了极大的可信度，使全世界对苏联和社会主义

《美国关于外层空间的政策，1960 年 1 月 26 日，国家宇航委员会》（“U. S. Policy on Outer Space”），《NSC 会议记录附专门咨询报告 1947—1960》（*Minutes of Meetings of the NSC with Special Advisory Reports*）第 3 卷，美国出版公司 1982 年版。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关注“空间第一”的重要性，NSC5520 就曾强调“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的国家必将获得极大的声誉和精神利益”；中情局是最为关注成功发射第一颗卫星的宣传意义的部门。在 NSC5522 号文件中，它将第一颗卫星发射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原子弹的心理冲击相提并论。详见《公开的故事和隐藏的项目：美国早期空间和国家安全政策》，第 180 页。

《苏联文件：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A Report on an Artificial Earth Satellite”），因特网：<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russ1.html>。

《苏联文件：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展可行性》（“On the Feasibility of Development of an Artificial Earth Satellite”），因特网：<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russ2.html>。

A. 西德奇：《科洛夫、人造卫星和国际地球物理年》（Asif A. Siddiqi, “Korolev, Sputnik, and the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罗杰·劳尼斯、约翰·洛格斯登主编：《重新思索人造卫星：第一颗苏联卫星发射以来的四十年》，第 51 页。

《苏联文件：在 IGY 之前首先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建议》（“Proposals of First Launches of Artificial Earth Satellites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IGY”），因特网：<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russ4.html>。

制度的印象大为改观。对美国来说,正如助理国防部长夸尔斯在其后不久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所说,“在这方面,苏联无意中对我们做了一件好事。他们的地球卫星已在实际上飞越了地球上所有国家的领空,并且没有遭到任何抗议”。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左右美苏决策的动力源自两个层面。一是在技术层面上,空间技术与导弹技术的“亲缘”关系使得空间技术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战略导弹的技术水平,因此美苏“空间差距”也即暗示着“导弹差距”。艾森豪威尔最初不甚关注空间技术的发展,但对导弹技术却持之甚笃,以致不想因卫星计划而泄露美国战略导弹发展的实况,但在卫星引发“导弹差距”这一说法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实施卫星与导弹并重的现实政策;二是在思想层面上,冷战中美苏的“威信竞赛”使得人造卫星威力大增。前述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转向实际上有着更深层次的冷战因素。纵观冷战时期,美苏间真正持久的战争是争夺国家威信、彰显本国政治制度优越性的政治战、心理战。外层空间为这一战争提供了最好的交锋平台,反过来,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也使美苏政府意识到这一战争的显性存在。这种空间活动政治化的结果使美苏的空间研究“主要不是出于科学上的考虑,而是由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所决定。主要的标准是,看某一项研究工作能把……军事潜力和在世界上的威望提高到何种程度”。前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三个外层空间政策文件都以苏联的空间发展做参照系,确立了美苏空间竞赛的态势。

尽管受国内国际政治因素的制约,艾森豪威尔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政策取向对美国外层空间政策的形成还是起着关键作用。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引起国内公众恐慌之后,艾森豪威尔希望把公众的注意力从空间竞赛引入到对美国教育制度的反思上来,并为此制定了1958年《国防教育法》。艾森豪威尔对载人空间项目一直十分反感,因此,尽管中情局认为苏联最近的外层空间发展重点是实现载人空间飞行,NSC5918号文件亦接受这一观点,要求“尽快合理可行地进行载人空间飞行的开发”,艾森豪威尔最终还是否决了包括“阿波罗”计划在內的一系列载人空间计划。

总之,尽管艾政府外层空间政策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进入“平复期”后,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根据冷战特征和自己的决策思路,制定出具备一定普遍意义的美国国家外层空间政策。有西方史家评论说,“直到里根政府,美国民用空间政策一直基于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之后的五年间确立的原则而运行。这些原则总体上是合理的,它们导致的政策也很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本文作者张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长春 130024]

(责任编辑:高国荣)

《在 NSC 第 339 次会议上的讨论》(“Discussion at the 339<sup>th</sup> Meeting of the NSC”),因特网:<http://history.nasa.gov/sputnik/oct57.html>。

列·弗拉基米罗夫:《俄国的空间讹诈:登月竞赛的内幕》,三联书店 1977 年版,序言。

巴巴拉·巴克斯代尔:《冷战的智囊:人造卫星危机与 1958 年国防教育法》(Barbara Barksdale, *Brainpower for the Cold War: The Sputnik Crisis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康涅狄格 1981 年版,第 78 页。

《国家情报评估,1959 年 11 月 3 日》(NIE 11 - 5 - 59),《美国外交文件 1958—1960》第 3 卷,第 325—330 页;NSC5918。丹尼尔·佩帕和约翰·麦金太尔:《国际空间政策:20 世纪及此后的法律、经济和战略选择》(Daniel S. Papp and John R. McIntyre, *International Space Policy: Legal Economic and Strategic Options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Beyond*),纽约 1987 年版,第 47 页。